

国家青年社科基金项目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

陈众议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8 号

拉美当代小说流派

陈众议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9 印张 230千字
印数 00001-15 00
1995年2月第一版 1995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41-3/C·51 定价: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说明

一、本丛书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理论著作,旨在扶植青年,繁荣学术。

二、选题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门类,著作范围不限,惟以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标准。

三、国家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及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成果是本丛书选收的重点。

四、入选著作的作者年龄均不超过 39 岁。

五、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数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急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

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即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果，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魔幻现实主义	(50)
第二章 结构现实主义.....	(115)
第三章 心理现实主义.....	(158)
第四章 社会现实主义.....	(186)
第五章 幻想派.....	(214)
结语.....	(266)
后记:现实与梦想	(270)

绪 论

拉丁美洲当代小说是狂欢，是奇迹。40年代以后，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和不断变化延泽拓展更新的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由于拉美社会的畸形发展，各种传统形态和方法在这里根深蒂固、长存不衰而新思潮、新观念又纷纷扰扰、层出不穷，由于这块处于不同文明的交叉路口的处女地对几乎所有事物都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拉丁美洲小说终于在无声无息中峭然崛起。

于是，丑小鸭变作天鹅，灰姑娘成了公主；昔日离乡背井，衣衫褴褛，满脑子皆是乔伊斯、福克纳的浪子，转眼间已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戴博士帽，脚踩奔驰车；一手挽着欧洲美女的纤腰，另一手高举威士忌酒杯，却言必称拉—丁—美—洲……

于是，拉丁美洲小说佳作纷呈，气象万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得其所，象牙之塔和人生舞台并行不悖；兴观群怨应有尽有，空灵飘逸亦无可，俨然是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的七彩世界。

然而，曾几何时，南美还流传着这样的奇闻：诗人是缪斯的宠儿，他们外出旅行可以免费乘车；小说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是缪斯的弃儿，没有钱就寸步难行。^① 故事属实与否已无从查考，事实是拉丁美洲小说起步很晚；但正所谓“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拉丁美洲小说不仅很快崛起，而且以巨大的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顺应并且推动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澎湃潮流。

① 路易斯·哈斯：《我们的作家》，南美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一、历史的回顾

众所周知,从属于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的美洲殖民地是没有小说的。小说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兴起,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煽动性与批判色彩。《十日谈》是这样,《堂吉珂德》也是如此,更不用说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了。因此,小说一直被视为成年人的体裁(或称“不惑的体裁”),^①具有批判的基因、暴露的本能。所以,西葡宗主国不约而同地禁止小说进入其美洲殖民地。第一部拉丁美洲小说《癞皮鹦鹉》(1816)是独立革命时期才产生的。它的作者、“墨西哥思想家”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是位力主独立的土生白人。作品用第一人称叙述“癞皮鹦鹉”的冒险生涯,展示了殖民统治的腐朽和殖民地人民的痛苦。创作手法继承了源远流长的流浪汉小说和 18 世纪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小说。

不久,浪漫主义传到了新生的拉丁美洲,时值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摆脱西葡宗主国而获得独立。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乱,这片几近贫瘠的土地已然满目疮痍,于是社会动荡,内战频仍,独裁横行,军阀肆虐,瘟疫蔓延。凡此种种,构成了 19 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历史特征。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反映了拉丁美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社会民主和个性解放的要求,表现出鲜明的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主义品格。象阿根廷作家何塞·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的《屠场》(1840)、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的《法昆多,又名文明与野蛮》(1845)及何塞·马莫尔的《阿玛利亚》(1851),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它们的主人公大都是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理想的英雄。

进入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拉丁美洲浪漫主义小说开始向感

^① 人类童年与神话即神的时代、人类青年与史诗即英雄时代、人类成年与小说即人的时代相对应。

伤主义转化。感伤主义把社会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损害了后者,从而主张“回归自然”。在拉丁美洲,也许哥伦比亚作家豪尔赫·伊萨克斯的《玛丽亚》(1867)堪称感伤主义代表作。与欧洲后期浪漫主义不同的是,拉丁美洲后期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取向是美化印第安人和南美潘帕斯大草原上的高乔牧民及其近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在拉丁美洲小说史上,自然主义虽然并没有形成独步一时的流派,但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自然主义与姗姗来迟的批判现实主义几乎同于19世纪末进入拉丁美洲。其时拉丁美洲的许多作家刚刚从感伤主义中摆脱出来,对它们采取了俱收并蓄、不加区分的态度。

由于缺乏别的名称,又鉴于在许多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里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我们姑且用自然一现实主义统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小说主潮。

最早将自然一现实主义介绍到拉丁美洲的是阿根廷的胡安·安东尼奥·阿尔赫里奇和巴西的席尔维奥·罗梅洛。他们同于19世纪80年代初撰文评介自然一现实主义及左拉的创作方法。此后“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便在南美部分国家中流行起来。一些自然一现实主义作品相继问世。举凡阿卢伊济奥·阿泽维多的《莫拉托》(1881)、卢西奥·维·洛佩斯的《大村庄》(1884)、埃乌赫尼奥·坎巴塞尔斯的《情乐》(1884),都曾在拉丁美洲激起轩然大波。有人从道德的角度攻击他们是“无赖”、“魔鬼”、“下流坯”和“千刀万剐的左拉的子孙”。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坎巴塞尔斯夫人居然与丈夫反目成仇,站在教会一边,对坎巴塞尔斯百般刁难。

然而,一种思潮——无论是文学的、哲学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的——得以传播、发展,常常受惠于反对派的攻击。拉丁美洲保守势力的攻击客观上扩大了自然一现实主义的影响。更多的作家开始注意巴尔扎克和左拉,锐意从他们的创作中吸取养分。自然一现实主义作品有增无已。

虽然拉丁美洲作家未能在理论上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所贡献,但是在实践中却为之增添了色彩。第一批自然—现实主义小说在忠于现实、忠于左拉实验小说原则——人类的一切都是生理机构作用的结果,而后者又为遗传和环境所决定——,描写一向受禁忌的题材如卖淫、犯罪、人的兽性以及其它变态心理的同时,暴露了导致这些现象的真正原因:社会病毒,使生于斯,长于斯的拉丁美洲读者大开眼界,并得以重新发现自己的大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主要社会病毒之一是野蛮。它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农村体现得尤其尖锐。亚马孙河流域、潘帕斯大草原,只消提一提它们的名字,便足以使许多人毛骨悚然。它们确是南美最野蛮的地区,自然—现实主义作家将它们视为孕育邪恶的温床。坎巴塞尔斯的《迷途》(又名《研究》,1885)就是对潘帕斯大草原这一孕育邪恶的温床的真实写照。

出于对城市生活的厌倦,《迷途》的主人公安德烈斯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移居潘帕斯草原。他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一座庄园和大批牧民。于是他成了那“世外桃源”的主宰、土皇帝。他剥削和压迫牧民,手段残酷;他戏弄和糟蹋妇女,兽性毕露。但是他很快又感到乏味与不足,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沉湎于烟花女子的怀抱。后来,时间和地理的距离勾起了他对庄园的思念,他重返草原。这时一位名叫多诺塔的女牧民已为他生下一女,自己却含恨死去。安德烈斯良心受到责备,决心用对女儿的爱来为自己赎罪。不料女儿天生羸弱,不久染病夭折。安德烈斯后悔莫及,自缢身亡。有人乘机将庄园洗劫一空,然后放一把火烧了。

安德烈斯是大草原的牺牲品。

19世纪末的潘帕斯大草原完全是个被文明遗忘的世界。那里猛兽出没,疾病蔓延;牧民们忍受着老天爷的折磨、强盗的威胁、庄园主的压迫。那里残存着原始的“初夜权”和奴隶制。那里要么是压迫人,要么是被人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安德烈斯在这个野蛮与

落后的茫茫草原中迷失方向,不知不觉地堕落、毁灭。

可见坎巴塞尔斯笔下的野蛮已不同于 80 年代前萨米恩托等阿根廷作家浓墨渲染的野蛮。后者或为鞭笞罗萨斯的专制统治,或为揭示统一派(文明)和联邦派(野蛮)之间旷日持久的党派斗争,很少涉及下层人民的生活和边远地区的现实。坎巴塞尔斯等自然—现实主义作家弥补了萨米恩托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不足,闯进了这些“被遗忘”的领域,充当了它们的“实验家”或“书记”。

在以后的作品里,尽管环境和题材不断变化,但坎巴塞尔斯的精神始终是社会因素决定人的命运。遗传和变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①坎巴塞尔斯代表了一代自然—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环境胜于遗传及其他的观点几乎同时见之于费德里科·甘博亚、曼努埃尔·加尔维斯、埃德华多·巴里奥斯的作品。

智利小说家埃德华多·巴里奥斯以他的《相思男孩的疯狂》(1915)触及被视为“大逆不道”的早恋,诅咒了智利社会的落后、保守与虚伪。相思的男孩是个私生子,从小受尽世人歧视和讥消,性格内向且多疑好思。他九岁时就情窦初开,爱上了一位姑娘。但保守、虚伪、压抑的环境使他始终不敢亲近他所爱的姑娘。久而久之相思变成了犯罪感,以至疯狂和痴呆。由于作者不吝笔墨,大肆展示人物的痛苦,结果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非难。他们指责他是猥亵、颓废作家。因此他必须时常用左拉的口吻说明道德不在于隐瞒事实。其实谁在这方面攻击他,谁恰恰也就成了作品针砭的对象。

在生活中,巴里奥斯是个浪漫青年,饱尝了遭人非议之苦。所以他对保守、落后、虚伪的智利社会深恶痛绝,对受尽犯罪感折磨的小主人公深表同情。

落后、保守、虚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社会病毒,对此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加尔维斯和巴里奥斯不无同感。在加尔维斯的成名作《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中,男主人公胡里奥与师范学校女教师

① 迪埃斯·埃·培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马德里,1982年,第1130页。

雷塞尔塔朝夕相处，过从甚密。这便引起了正人君子们的种种猜疑，流言蜚语不径而走。然而说来也怪，人们的无端猜疑反而使他们俩真正相爱起来。他们同居了。这还了得，顿时舆论大哗。他们被孤立了，成了众矢之的。胡里奥不堪忍受这种处境，抛弃雷塞尔塔，扬长而去。胡里奥的不辞而别导致了雷塞尔塔的流产。她身败名裂，忧郁成疾，险些丧命。末了只好躲到一个偏僻的山村当小学教员。一般读者容易被加尔维斯赤裸裸的性生活描写所迷惑，对作品产生误解，认为它的主题是性爱和遗传——雷塞尔塔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她母亲是个行为放纵的女人，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性和遗传的描写仅仅是出于一种时髦。同时代的许多自然—现实主义作家都带有类似的时髦信念，强调一下遗传因素，触及一下禁忌题材，就象我国近期的影片总要安排几个交谊舞镜头，总有接吻之类的亲密动作一样。

性和遗传也是墨西哥作家费德里科·甘博亚的两个主题。甘博亚素有“拉丁美洲的左拉”之称，他的代表作《圣女》(1903)则被视为拉丁美洲的《娜娜》。甘博亚把墨西哥城当作一个“实验室”，把那些统治阶级最忌讳人讲的事实一一搬到他的显微镜下。在这些事实中有卖淫、赌博、凶杀以及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等等。诚然首当其冲的是无法控制的卖淫。

《圣女》写一个天真的农村姑娘进城后沦为妓女的悲惨故事。女主人公离开家乡，独自到墨城谋生。可是堂堂墨城，茫茫人海，竟没有一人向她伸出救援之手。善者对她漠然相向，更多的则是拿她寻欢作乐。最后她终于沦为娼妓。她几度挣扎着跳出火坑，但很快又被无形的手推回去。数年后，她体力衰竭，风韵荡然，被老鸨逐出娼门。她贫病交加，孤立无援，弥留之际，唯有双目失明的风琴手伊波利托在她身边，充当了她的忏悔牧师，并为她奏响挽歌。她所以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之一是她的曾祖父那个浪荡公子的遗传：“在她的血脉里流动着她曾祖父的那块肮脏的隐血。”

虽然甘博亚囿于当时的知识，用当时的眼光从生理学决定论

的角度指出了卖淫现象得以存在的一个潜流(“隐血”),但从不否定这个潜流得以迸发并且畅流无阻的原因是腐化的社会。

腐化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病毒。为了真实地再现社会的腐化和腐化的社会,甘博亚对墨西哥城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个号称拉丁美洲文化中心的大都市不仅妓院多于教堂,妓女多于修女,而且连教会本身也早已为那些只知道偷鸡摸狗的神父和不干不净的修女^①所玷污。

《圣女》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腐朽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读者固然可以认为女主人公的一生没有什么可歌颂的地方,但却不能不同情她,为她流泪。因为她是腐朽社会的牺牲品,是腐化的墨西哥这个庞大的妓院中唯一试图自拔的“圣女”。正因为如此,“圣女”这名字恐怕不象有些评论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对女主人公的讽刺。它寄托了作者对她的怜悯与敬意。墨西哥有一句俗语,叫做“知耻是神圣的”。

此外,黑暗构成小说的主要“布景”。夜幕下,墨西哥揭去了面纱,露出腐朽的脸庞。作者对市民的夜生活作了细致入微的纪录。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唯一的明人是盲人伊波利托。

除却野蛮、落后、保守、伪善及腐朽,拜金主义、贫困、种族歧视等也是拉丁美洲作家憎恨的社会病毒。随着拉美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金钱这个人尽可夫的娼妇愈来愈为人们所顶礼膜拜。米罗的《交易所》(1891)以犀利的笔锋揭露阿根廷社会日益膨胀的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与左拉的《金钱》遥相呼应。在此之前,另一位阿根廷作家卢西奥·维·洛佩斯在《大村庄》(1884)中以19世纪8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背景,塑造了一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的形象布兰卡。她为了得到一笔遗产,对其可能的继承人大献殷勤,甚至以身相许。后来遗产落到一个比她年长

^① 甘博亚的《变形记》(1899)写一个耽于肉欲的修女的荒淫生活,遭到教会的强烈抗议。

三十的老头手中，她便摇身一变，成了老头的情妇。一旦遗产到手，她又不惜抛下他和他们年幼的女儿，独自去肆意妄为，尽情挥霍。阿尔赫里奇的《无辜者和有罪人》(1885)的主人公同卢西奥·维·洛佩斯的布兰卡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为了金钱背叛父亲，背叛妻子，出卖人格，出卖灵魂。

与金钱相对应，贫困是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社会病毒。波多黎各小说家塞诺·甘蒂亚受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启迪，准备写一部卷帙浩繁的《社会病毒记实》。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他仅有的几部作品足以证明他的文学天赋和他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他的系列小说中的《低洼》(1894)和《扒手》(1896)等把波多黎各比喻成既贫穷又肮脏的臭水坑，恰似一部部记录影片，将这个曾经以其富饶誉满天下的国家的赤贫和腐朽景象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作者还不厌其烦地描摹下层人的悲惨生活和由此造成的他们精神上 and 肉体上的畸形。

智利的爱·贝约和巴尔多罗梅·利略也是擅长描写赤贫的作家。贝约的作品中充满了贪杯好色、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城市贫民。他象福楼拜那样，认为艺术应该是科学的、客观的，作家的任务只是将其所见所闻移植于文学作品，否则就是撒谎。利略是第一个表现工农大众的拉丁美洲作家，在《下界》(1904)和短篇小说集《在底层》(1907)中，利略象一个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摄下了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工人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他象左拉那样，反对作家脱离生活、面壁虚构，主张深入生活，以便在创作中占有翔实的材料。他往返于酒吧间和贫民窟，并先后到罗塔大煤矿、兰卡大矿区、北方矿场和中部农村体验生活。他亲口品尝工人农民的饭菜，亲手帮助工人农民干活，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创作中力求运用工人农民自己的语言，使作品具有生动、朴实的风格，深受自由派人士的欢迎。

种族歧视也是一种流行甚广、危害极大的社会病毒。自西班牙征服美洲起，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一直处于受压迫、被奴役的地

位,即便是独立战争以后,他们的命运也未能有实质性的改变。但19世纪80年代以前,各种族之间的关系以及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生活被严重歪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印第安小说和其他有关的浪漫主义作品。这类作品一般都以纯粹的欧洲浪漫主义情调美化美洲社会,并把美洲土著打扮成这个理想化世界的英雄。譬如在厄瓜多尔作家胡安·莱昂·梅拉的《库曼达》(1871)或巴西作家阿伦卡尔的作品中,印第安人具有崇高的骑士风度,他们的生活原始而富于诗意。同样,在浪漫主义感伤主义代表作《玛丽亚》中,读者看到的是一首优美和谐的田园诗。伊萨克斯是这样描述白人主子与黑人奴隶的关系的:“父亲既不失主人的身分,却又对他的奴仆们客客气气,亲亲热热;对他们的贤妻不吝恭维,见到他们的孩子则抚爱一番。”“仆人们整洁的衣着,愉快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奴仆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①。

拉丁美洲自然—现实主义作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迥然不同的图画。在这里,白人与黑人、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敌对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种族、阶级的关系。最先在小说中抨击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拉美作家是巴西的阿·阿泽维多。他的成名作《莫拉托》揭露了巴西种族主义者的残忍和卑鄙,振聋发聩。《莫拉托》问世后,理想化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浪漫生活在文学中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1889年,开印第安小说先河的秘鲁女作家克罗琳达·玛托·德·图尔内尔发表了《没有窝的鸟》,公开谴责对印第安人的野蛮奴役。《莫拉托》和《没有窝的鸟》启迪了拉丁美洲一代作家。一个个暴烈的、血腥的、梦魇般的种族压迫的真实场面,开始通过自然—现实主义作者之笔凸现出来。

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如上种种社会毛病的真正病根并不是当时的自然—现实主义作家所能够完全认清的。资本主义制

① 伊萨克斯:《玛丽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页。

度是新生事物，自然—现实主义作家对它大抵是抱有幻想的——尽管他们已经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金钱交易——他们往往把这些社会病毒归咎于独裁统治和反动教会，把根除独裁统治、反动教会和一切社会病毒的希望寄托于科学和进步。这是19世纪末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①

拉丁美洲没有经历过类似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的社会变革，产业革命尚未完成，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拉美许多国家建立起来，但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方式——债役制、行会制、封建租佃制依然存在，政治生活中也保留着军阀和僧侣的等级特权。所以独立战争后许多拉美国家的命运控制在军阀和僧侣手中。军阀利用手中的武器攫取政权；教会则以神权和财产两大法宝，掌握着拉丁美洲的经济命脉。^②这些严重阻碍着拉丁美洲社会的发展。为了清除这些障碍，拉丁美洲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自然—现实主义文学顺应这一斗争的需要，对专制军阀和反动教会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反独裁小说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卢西奥·洛佩斯的《大村庄》、米罗的《交易所》以及阿西德斯·阿格达斯（玻利维亚）、鲁·布·丰博纳（委内瑞拉）、洛伦索·马罗金（哥伦比亚）、马利亚诺·阿苏埃拉（墨西哥）等自然—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无情鞭笞了这些军阀的反动，大肆铺陈地描写独裁、军阀魔爪下的病态社会：恐怖、落后、野蛮、贫穷等残酷的丑恶。记得丰博纳有这样一段名言：“我的

① 19世纪末，西方掀起了“唯科学主义”热潮。人们受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盲目崇拜科学，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一思潮传到拉丁美洲，立即引起了自由派的欢迎。拉丁美洲国家的“科学家派”就是当时产生的高唱“科学救国”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团体，对拉丁美洲社会产生了影响。

② 以墨西哥为例，天主教会到19世纪中已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不动产和不受国家权力管辖的特权。

周围没有美,没有欢乐,我的精神备受折磨。我不能在虚无中杜撰美和欢乐……倘若有人认为我的作品不够美,这没有关系,因为我的作品描绘了人间地狱。”^①

这些反寡头小说在时代的进步心灵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反响,推动了拉美社会民主革命的浪潮。

与这些反独裁小说同时产生的反宗教小说是对反动教会的一次清算。它戳穿了宗教的虚妄、僧侣的伪善,从而得出摒弃宗教、提倡科学,才能解救社会的结论。反宗教小说从阿·阿泽维多的《莫拉托》到曼努埃尔·加尔维斯的《修道院的阴影》(1917),历时三十余年,产生作品二十多部。其中《莫拉托》、《没有窝的鸟》、《变形记》和《修道院的阴影》反应强烈。《莫拉托》谴责教会是种族主义的堡垒,是杀害莫拉托的原凶,并指出所谓的上帝“旨意”纯属骗局;《没有窝的鸟》写一个神父为了维护上帝的“尊严”抛弃私生子、导致私生子与同母妹妹相爱后双双自尽的悲剧;《变形记》把修女描绘成妓女,把修道院贬作娼门;《修道院的阴影》则以雄辩的事实揭露教权主义的罪恶。总而言之,反宗教小说从不同角度抨击了宗教的虚妄和神职人员的伪善,在舆论上动摇了教会的威信,为资产阶级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反教权斗争创造了条件。

这是自然—现实主义对拉丁美洲社会造成的第一个冲击波,波及面很广,几乎暴露了独立战争后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社会弊病,鞭达了阴暗、污秽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仰,并使拉丁美洲作家第一次将视线投向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为他们的凄惨生活鸣不平;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不可一世的僧侣阶层和统治阶级,揭露它们的丑恶本质;第一次把被浪漫主义文学颠倒的有关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凡此种种,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题材和内容,声援了拉丁美洲社会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自然科学之应用于

① 丰博纳:《美女与野兽》,马德里,1939年,第5页。